

学校没有分数行吗？

学校没有分数行吗？

〔苏〕沙·阿·阿莫纳什维利 著

朱 佩 荣 编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学校没有分数行吗？

【苏】沙·阿·阿莫纳什维利 著

朱佩荣 编译

责任编辑：王树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太平庄·北环西路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125 字数 101,000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400 册

统一书号：7232·332 定价：0.90 元

译者的话

这里编译了苏联当代著名教育家沙·阿·阿莫纳什维利近年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十几篇文章。

沙·阿·阿莫纳什维利是苏联心理科学博士，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格鲁吉亚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是一位象瓦·阿·苏霍姆林斯基那样著名的教育家和实际改革家。从1961年起，他在格鲁吉亚致力于改革小学教学的实验。1964年，他在格鲁吉亚教育科学研究所实验教学论实验室开始了“没有分数的教学体系”的教育实验。1976年，苏联教育科学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他的实验教学体系，支持他的实验。苏联教育科学院前任院长斯托列托夫曾说，“苏联教育科学院的学者们正在考虑支持格鲁吉亚同行的研究。当然，这是一项很费力的事业，需要付出许多精力和时间。然而，它在原则上的现实性和实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什·阿·阿莫纳什维利改革小学教学的实验，在于研究如何改革小学教育（儿童六岁入学），使学生的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既提高质量又减轻负担。他的实验分三个阶段，共17年，有320名教师参加了实验教学工作。苏联教育部1985年颁布新十一年制学校小学招生办法中规定，在小学一年级班取消分数和考试，学生没有家庭作业，书包不必背回家。应该说这是得益于阿莫纳什维利的实验教学

经验的。

分数弊端很多，甚至分数害死人。对此阿莫纳什维利有精辟的批判分析，他说人们把分数视为“偶像”，成为好学生、坏学生的代名词，成为评价一个学生的价值的标尺。实际上分数是成人压制儿童服从大人意志的手段，是对学生社会压力的手段。分数是师生冲突、学生间冲突、家庭冲突、家长与教师、学校与家庭冲突、家长间冲突的祸根。分数是教育的悲剧之源，它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极大的障碍。自私、嫉妒、虚荣心、弄虚作假这些坏品质，也跟分数有很大关系。他极有风趣地描绘，教师上课总是带着“一口袋”分数走进教室，如果没有分数，就象陷入敌阵而又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一样束手无策。有了分数，教师象在集市上做买卖的小贩，给你2分，给他5分，把学生兴趣放在追求分数上，而不是放在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上。分数是传统教学体系中的“顶梁柱”。学校没有分数行吗？阿莫纳什维利的回答是：

“行，不仅行，而且质量高，花时少”。

当然取消分数，并不等于对学生作业不作评价。儿童希望对他的作业有一个评价，但不喜欢“评分”。阿莫纳什维利在实验教学中废除了在传统教学中借以评定学生学业成绩的分数，采用形成性评价方法以取代形式主义的数字记分法，使学生形成自我评价的能力。

取消分数仅仅是阿莫纳什维利改革传统教育的突破口，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改革的实践是极其丰富渊博的。他说，他的实验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师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现象，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组织教学和整个

学校生活，使学生得到学习的快乐、认识和发展的快乐，乐于学习，把精力放在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上。教师要实事求是地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在《老师，你小时候穿过开裆裤吗？》一文中，批评传统的教科书、教学大纲、教学方法都是从大人的立场出发拟订的，并不反映儿童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学习自然就成了了一件苦事。他要求教师真正相信每一个儿童的能力，对儿童的前途抱有信心，并把儿童学习中的失利，首先把过错归罪于自己在教学上没有区别对待的结果，并设法帮助学生加以补救，而这种补救又要从相信儿童出发，使他相信，他是能够学好的。他要求教师在与学生交往中要合乎道德规范，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他的尊严。教师对学生愤怒地提高声音说话、呵斥、辱骂、对学生冷酷无情、傲慢、恐吓、强制手段等等都是不能容许的，这是教师的无能，是教育上的笨拙之举。阿莫纳什维利特别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合作，他认为这是使学生乐于学习的秘密之所在。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学生感到自己不是教育影响的客体，而是有独立的人格的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在教学方法方面，他也有许多新颖的方法，他说：**我所致力的目标，是要找到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不是把知识“填入”儿童的脑袋，而是让他们自己设法向我夺取知识，通过孜孜不倦的探索去获得知识。**

阿莫纳什维利在回忆列·符·赞科夫时说，有一次，列·符·赞科夫说：“智慧、心灵和双手——这三者的整体性与和谐，这就是一般发展的实质之所在”，他说话的时候，先把右手放在前额上，然后移到心窝处，最后向前伸出了双手。我是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话的含意的，即**儿童是一个整体的**。

个性，因此我们吸引儿童参与的教学过程，应当不仅触及他的个别的属性，而且把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发动起来。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和阿莫纳什维利有书信往来。当孩子们把格鲁吉亚文本《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送给他，并在扉页上签上36个人名时，阿莫纳什维利激动地说：**我坚信教育的强大力量！教育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区别对待地发展每一个学生的智慧和形成他的个性特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以普遍的友爱和与人为善的精神感染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我们编译的这本书，只是初步对阿莫纳什维利教育思想和教改实验的一点介绍，相信会受到我国中小学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喜爱的，至编译中的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杜殿坤同志写了《阿莫纳什维利减轻小学生负担的实验述评》一文，编入书末，对读者了解本书会有帮助，谨致谢意。

编译者

1986年5月

目 录

学校——没有分数行吗？	(1)
附录：全神贯注地学习	(10)
发展初等学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6)
畅想六岁学生的明天	(25)
吉祥的燕群	(40)
汤姆·索亚们的暑假	(47)
别做人间的鲁滨逊	(53)
学校的一万一千个台阶	(59)
会和要	(66)
三十六个教育谜语	(74)
第一千堂课	(81)
使环境成为人道的	(89)
儿童需要有一个怎样的爸爸？	(99)
阿莫纳什维利减轻小学生负担的实验述评 杜殿坤···	(108)

学校——没有分数行吗？

苏联格鲁吉亚Я·С·戈盖巴什维利^①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科学博士И·А·阿莫纳什维利^②与《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记者：总而言之，您建议不给学生打分数，是这样吗？

阿莫纳什维利（以下简称“阿”）：是这样，我们在低年级的几个实验班里取消了分数。是呀，这在目前毕竟还只是一种实验，虽说它已进行了好久了。但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取消分数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对儿童的学习劳动就可以丝毫也不作评价了。儿童们希望对他们的作业有一个评价。但是他们不喜欢“2”分、“3”分，甚至连“4”分也不想要。正因为这样，他们往往会把作业本上的分数涂掉，甚至把有分数的这一页纸撕掉。……就这样，我们自己创造了一种使儿童说谎的“教学法”，为了纠正这种状况，后来我们就进行了其它教学方法的探索，……

^① Я·С·戈盖巴什维利（1840—1912）是格鲁吉亚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和儿童作家，写过儿童读本。格鲁吉亚教育科学研究所他的名字命名。——译注。

^② И·А·阿莫纳什维利是当代苏联著名教育家，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格鲁吉亚人。关于他的学术职称和学衔，在本书选自《教师报》的各文中，注明为“教授、心理科学博士”。——译注。

教师与儿童的交际的性质——这是整个学校活动赖以建立的基础。我们发觉，师生交际的方式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专制主义的，另一种是所谓人道主义的。前者是靠强制手段、处分和分数的恐吓来维持的，后者则是建立在师生平等相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不用说，在按专制主义方式教学的情况下，分数是不能取消的。怀有专制主义思想的教师是带着满满的“一口袋”分数走进教室的，要是没有了分数，他就会象一个陷入了敌人的营垒而又失去了战刀的士兵一样束手无策。有了分数，他又象一个在集市上开始做买卖的小贩：有知识——就给你“5”分，没有知识——拿“2”分。这样一来，就使学生都把兴趣放在追求分数上，而不是放在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上。大家知道，在格鲁吉亚造房子时总要按一根支撑整个建筑的“顶梁柱”，如果把这根“顶梁柱”一拔掉，整个房子就会倒塌。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中的分数也就是这种“顶梁柱”。

然而，在有分数的条件下，即使改变交际的方式，分数还是会妨碍、破坏教师与儿童之间的互相信任的气氛的，还是会使儿童本身对学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抱不正确的态度的。关于这一点，在我们的实验班中有一个班的儿童都这样说：

“分数把我们吓死了，因此我们就不能好好地学习。现在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发言了，甚至还可以同老师辩论。可是就在我妹妹读书的班上，老师们却不允许同学们多嘴。”

“我觉得，在有分数的班级里会破坏我们的友谊。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成绩。而在我们班级里大家都互相帮助。”

下面是一位女教师说的话，她表达了按照我们的教学体

系工作的大多数教师的意见：

“在实验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不给儿童打分数；我与我的学生们之间的友谊，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彼此真诚”。

不错，我们取消了分数，但这并不等于对学生的学业不作评价。我们只是对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劳动作深入而多方面的评价的方法取代了抽象的分数。这种评价最初是由教师本人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作出的，其出发点是对学生的能力要抱有最乐观的信心，以后又逐步地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全班，传授给每一个学生，让他们自己检查自己，自己评价自己。教师与学生们一起给每一个学生写鉴定，向家长和客人汇报，这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的学生要升入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建议他们自己给自己评分，在事前与他们一起制定了用分数评定自己和同学的知识的方法。记分册也发给他们自己——我，一个教师，干吗需要记分册？让他们自己给自己打分数，你们赞成吗？

你们可要知道，孩子们给自己打的分数都是十分客观的，而且也有给自己打了以前由教师给他打的那个“3”分的，可是对这个“3”分，他却是心悦诚服的。从他们的这种态度中可以看出：我们——教师和儿童——是一致的。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的整个教学体系的目的，就在于要消除自古就有的师生的对立和冲突现象。杰出的格鲁吉亚心理学家Д.Н.乌兹纳泽^①把这种对立和冲突称为“教育的大悲剧”。在树立新型的师生交际方式的过程中，我们不断

^① 乌兹纳泽·季米特里·尼科拉耶维奇（1836—1950）——苏联著名心理学家，格鲁吉亚人，苏联心理学上定势理论的创立者。——译注。

地逐年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于它有碍的东西。就象批改作业本这种看上去很细小的一件事也是这样。在学生的作业本上用红线画出错误，这已世代相沿成为习惯了。可是有一次就有一个女孩子面对着被我用红线画满了的作业本大哭不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回忆起了自己的苦闷和对那些象商量好了一样总想在我的作业本上只找错误的教师的愤恨。于是我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儿童：经常指出他们所犯的 error，还是指出他们取得的成绩？让学生特别注意什么更好：不该怎么做，还是应该怎么做？什么将更有利于促进他们的发展：失败的苦恼，还是胜利的欢乐？那么把标志着“不及格！错误！你怎么就不害臊！”的红墨水与标志着“优良！为你高兴！该这样，好样的！”的蓝墨水两相更换一下，也许会值得的么？

现在，在我的办公桌上放有两支自来水笔：一支是红墨水的，一支是蓝墨水的。在儿童的作业本上我用蓝笔着重勾出一切我所喜欢的和认为是成功的地方。那么错误呢？我首先把学生作业中的错误看作是自己教学工作失策的结果，把错误归罪于自己，并用红笔记入自己的一个专门的本子里，以便考虑怎样在几堂课上很自然地 and 不知不觉地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当教师的怎么能想方设法地尽找儿童的错处！原来，只要对儿童的态度一转变，班级的面貌马上就会完全改观。我们的教师在刚开始采用新方法批改作业本时就承认：“我们自己的心情也舒坦起来了！”

记者：总之，你们已抛弃了对学习的消极刺激因素——分数、对错误的恐惧……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才是您的学生们

在认识过程中的动机呢？

阿：我正要想说这个问题，首要的，这是自由选择感。自由选择感是儿童通常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最强烈的需求之一。要知道，正如Д.Н. 乌兹纳泽所说的，儿童是自己的需求的俘虏。换句话说，不应该拒绝这种需求，把它弃之校门之外，而是要把它当作教学手段的同盟者。

当然，按照什么教学大纲去教他们，他们想按照怎样的教学方法学习，用怎样的方法教育他们，他们是不能选择的。但是，对教师来说，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要具有在课堂教学中创造自由选择的情景的教学艺术，在这种自由选择的情景下，学生可以自愿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获取需要的知识。在我们的实验班里，创造自由选择的情景是从上课一开始就做起的。教师事先把学习的课题写在黑板上，让儿童们自己来选择其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课题，教师提出建议：从哪一个课题开始，哪一个课题最感兴趣？在上课的过程中还经常向儿童们提出：该给你们做怎样的习题：容易的还是复杂的（通常，儿童们都选择复杂的）？为明天准备怎样的例题？在这几首诗中你们想回家熟读哪一首（这时孩子们常常会有一番争论，结果往往决定要熟读所有这几首诗，因而在第二天的课上我们就得举行整整二节课的诗的朝会）？最后，我还建议他们对这节课作出评价：最满意的是什么，哪儿该改进？

或者，在黑板上写一个复杂的例题时，我故意弄出错误来，我装成陷入了“困窘”，大声地说着自己的推论，——这时就有很多孩子举起了手，想来纠正我写错的地方。孩子们喜欢争论，喜欢提出自己的见解，——我就给他们提供这

种机会，而在总结的时候，我一定要感谢他们对我的提醒，或者请他们原谅：“也许，我忘了戴眼镜，所以才搞错了”。在这种情景下，孩子们觉得自己是教师的战友，他们很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非常不愿意充当一个万事皆知、一贯正确的教师的“受教者”。

要不，我会给孩子们说：“让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吧！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朋友；你们——是我的同事，认认真真的大人；我呢——让我还是当一个教师吧，不过我现在有点心不在焉和健忘，你们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要警惕着。我——是游戏的领导人，我现在要帮助你们把这个想象的情景变为现实；帮助你们相信，你们真的是大人，是认认真真的大人。我们就一起来创造我们的课吧！说真的，我‘不知道’，在‘祖国’这个单词中有几个语音？5个？也许是7个？假设在10小时内每隔一小时从车库驶出8辆汽车，在车库里还剩几辆？我不知道。如果驶出7辆呢？我也不知道。你们干吗那么性急？我‘赶不上’你们了！”

我所致力的目标，是要找到这样一种教学方法：不是把知识“填入”儿童的脑袋，而是让他们自己设法向我“夺取”知识，经过与我的智力“搏斗”去掌握知识，通过孜孜不倦的探索去获得知识。因此，每当我看到，孩子们认真地在思考，找到了有趣的答案的时候，我常常要象对自己的同事一样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记者：那么，你们的学生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将升入的那些班级的教师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阿：因人而异。有的教师肯定地说：“只有教这样的儿童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而怀有专制主义情绪的教师则

愤懑地说：“最不守纪律的班级！”确实，我们的学生不会盲目服从，他们的批判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很强的。从强制和压服的立场出发，当然是很难去教他们的。

记者：沙尔瓦·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中，您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在学校任课的所长之一。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您的习惯吗？

阿：不如说这是一种需要吧！我深信，在学校任课，对于一个教育科学工作者来说，就好比早操对于运动员之必不可少一样。我们早在1961年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在我们的研究所刚成立了实验教学论实验室。不知为什么，教育学实验室通常都坐落在某个僻静的角落，同学校和紧张的学校生活离得远远的。我们的实验室就直接设在学校里。我们有一条座右铭：学者自己应该掌握授课的技巧和方法。如果他不会授课，就要剥夺他写学术著作的权利。我现在就每天先到学校去，讲授一至二节课，然后再到研究所去工作。

记者：我们认为，您的教学体系赖以建立的对儿童的新态度，这不仅对“6岁学生”和初等学校是需要的，而且，也许它将有可能会给所有的学校注入新的活力。

阿：我很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在高年级继续进行实验的小组。但就总体上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从实际上进行学校改革，那就必须从改造教师本身的心理开始。如果教师本身的内心世界依旧，不改变自己的儿童观，那么，无论课桌椅多么漂亮，专用教室的设备多么精良，甚至一再提高教师的工资，都是改变不了学校的面貌的。他还是会改头换面地使任何一种新的教科书去适应自己的旧观念的。改革为教师开辟了从事创造活动的广阔天地，

——在党和政府关于学校改革的所有文件中，恰恰都指明了创造的方向。可是，在不信任儿童，教师不力图与儿童平等相处的地方，未必会有什么创造可言。学校改革的文件已经通过，——现在轮到我们教师做文章了。我们是否能够按照新的要求来改变工作方式呢？

……记得有一次，我想把我的喜悦告诉我的同事们：我的“6岁学生”们，在经过按照专门设计的教学方法进行的教学以后，在第一学年的春天就已经会写很出色的作文了。我的话音刚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困惑莫解的话——回报给我的是惊异，而不是喜悦。他们都认定，我在欺骗他们！“儿童不可能掌握那样的知识，……”“存在着年龄界限，……”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从这些专横的论断中，我感觉到了一种僵化的儿童观：既然过去向来是这样，那么，将来总还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学、教学方法、教师的创造还有什么价值呢？“儿童不可能做到！”这种论断不是在捍卫儿童免遭对他们正常发展进程的蓄意侵犯，而是在设置一道道阻碍他们发挥实际能力的障壁。

《共青团真理报》记者

O·马里尼切娃

H·克维日纳泽

（译自《共青团真理报》，1984年8月15日）

〔译者注〕：作者在1935年11月12日《教师报》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批评了苏联教育科学落后于生活的缺点，认为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没有天才的学者，而在于很多学者都是在办公室的“温室”里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写学术著作的。他认为，只有在教育科学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齐心协力地一起共同探索，揭示学校工作的迫切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情况

下，教育科学才能成为“生产力”。他把那些脱离学校生活实践，闭门造车的教育学术著作称之为“书斋的教育学”，“对这种著作，广大教师是不会信赖的。他号召教育科学工作者深入到学校的实际工作中去，认为，一个真正的、现代的研究教学和教育问题的学者本人应该掌握教育八十年代的儿童的技巧和艺术，善于与儿童交往和共同活动，认为这样的学者总结出的教育理论和写出的教学法参考书就会成为教师的引路人。